

第八章 实行革命

战后流行的大杂烩式的新词语，许多都与激进的政治活动有关。最早出现的两个术语“统一民主战线”和“民主人民战线”，指的是构想中的日本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携手联合，最终却未能实现。这种语言风格与富有煽动力的表现，引起胜利者的震惊完全可以理解。日本之外的人，很难想象战败的敌手除了对胜利者屈从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作为。更何况，大多数美国人从自己国内的民主经验出发，真诚地认为激进的政治运动完全超出了界限。

“粮食五一节”，似乎是另一项由左翼发起、对精心控制的自上而下的革命造成威胁的运动。这是发生于1946年5月19日的一场抗议政府陷入危机的粮食配给制度的全国性示威游行。自1920年起，日本的劳动者每年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1889年由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即第二国际所设立，作为对劳动者团结的呼吁），直到1936年被政府禁止。战争结束后，庆祝活动在传统的5月1日这一天恢复，而“粮食五一节”，则是这种表达团结与抗议的传统活动连带的创举。同月，大学生们也宣布了他们自己的“学生五一节”。这一切都使征服者们感到困惑。

“生产管理斗争”也使他们感到困惑。从1946年开始，这种情况月复一月地持续。在这项大多是自发的工厂运动中，白领与蓝领劳动者一度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权，在经营者不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坚持生产。

回顾说来，胜利者由于未在日本经济重建中承担积极的角色，显然无意之中助长了旨在推进政治的自由化和社会改革的激进行动的风行。

实际上，在这种放任政策下，生产停滞、物价飞涨。工人阶级当然易于接受左翼的一系列诉求，而一大批学者和媒体也匆忙表明对激进改革的支持。如果说，战败的破灭，后果之一是导致了精疲力竭的虚脱状态，那么另一后果则是对“和平”与“民主”的衷心希求，而第三个结果则是对由启蒙先锋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期待——这种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据辩称，这一目标可以无须暴力和流血就能实现。其挑战则是如何将征服者的民主革命和平地转换为社会主义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在战败后的混乱之中，早期的改革举措，比如释放政治犯、共产党的合法化以及制定像1945年12月《劳动组合法》这样强烈同情劳工的法律，在实质上都保障了比胜利者所预见或希冀的更为激进的运动的出现。由于获得了组织结社的自由，社会党和共产党迅速登上了政治舞台。由于获得了成立工会、团体交涉和罢工的自由，劳动者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活力投身其中。无论社会党的左派还是中间派，都在选民和劳工运动中获得了重要的支持，重组的日本共产党，博得了无数媒体的关注，而且在工会组织中势力大增。

1946年1月中旬，众望所归的领袖野坂参三，从他长期逗留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回到日本，日本共产党的诉求变得更为宽泛。野坂归来立即冷静地表示，顺应占领军的改革议程与人民的愿望，推进和平的革命。当野坂还在博多港至东京的列车上时，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创建“可爱的共产党”的声明。“可爱的共产党”的说法，如此矛盾搭配的修辞使一些在场者深感骇异，同时却令更多的人感到魅力无穷。野坂参三抵达东京的共产党本部，被看作是一件名人盛事。（一家报纸困惑地报道说，无论是身着和服还是西装的年轻女性，都像追星族在剧场门口守候明星一样，等待野坂的到来。新闻报道复述当时热情的场面：“太棒了！每个人都挥舞着红旗！真是妙极了！”）在野坂归国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他谈到了目睹日本遍地废墟所造成的冲击。他警告说，特权阶级、保守官僚与“军国主义者和战争罪犯”仍然是民主化的极大障碍，并向他热心的听众们强调：创建民主的人民战线，“在今天，绝不只是意味

着试图通过颠覆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将战时的军国主义宣传用语转而用于战后新的意图的绝好例证，野坂严厉谴责了“所谓的爱国主义者”毁灭了国家，并宣布“我们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护卫队”。翌月通过的共产党纲领，显然受到了野坂的影响，纲领宣称“日本共产党，将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法，实现现在进行中的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当下和根本的目标”。

野坂参三本人还缓和了共产党先前关于天皇制的强硬立场，他提出，尽管有必要反对作为“国家制度”的天皇制，但是天皇作为宗教领袖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可伺真正的人民民主体制建立之后，交由民众投票选举解决。野坂最初于1945年4月，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起时，提出了这一主张。是年2月，约4万人出席听取了野坂对民主人民战线本身（而不仅仅是日本共产党）作为“新的意味的爱国战线”的构想。¹

尽管在1946年4月的总选举中，野坂参三与其他4位共产党人当选为议员，但是日本共产党的最大影响力并非在于议会政治场合，而在于组织工会和动员群众的抗议运动。共产党、社会党左派与右派，三方之间发生了争夺主导权的激烈斗争，最终共产党成功掌握了大约2/3的工会劳动者。考虑到工会运动的迅猛扩展，这的确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到1945年底，工会会员达到38万人。一个月后，这一数字又增加了超过257 100万人。到1946年底，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数量上升到大约560万人，1948年中，这一数字达到约670万人的峰值，当时非农业劳动人口中超过半数都加入了工会组织。²

由于通货膨胀同样深刻地影响着白领和蓝领劳动者，当时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其后果之一就是白领阶层广泛地加入工会组织。因为公共部门的工资级别比起私营部门要落后得多，所以公务员们对共产党的较具攻击性的主张更易接受。新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他们新获得的权利进行团体交涉并举行罢工，导致在整个占领期劳资纠纷事件频发。从1946年初到1950年底，劳资纠纷记录约6432起，涉及1900万劳动者，其中包括3048起罢工事件，有近500万劳动者参与。大多数纠纷集中于薪酬问题，并且得到了相当迅速的解决。³

工会迅速组织起来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由于战争年代劳动者作为“总力战”动员的一部分，被按照会社、产业乃至全国的层面组织起来。一旦战争年代爱国奉仕的理由被摧毁，这些既存的工会组织和全国的联合团体，很容易被政治左翼动员起来。同时，更令人震惊的是，生产现场劳动者的激进化，推动了正式工会组织以外“生产管理斗争”的过激运动。由于缺乏共产党或是社会党方面的正式支持，“生产管理”运动，看来代表了草根层面真正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思潮的出现。单个企业的雇员们，大多自主行动起来，接管他们所在的事务所、工厂或矿山，抛开企业主或管理层继续经营。

当初，“生产管理斗争”是一种激进的战略，其本身并非目的所在。劳动者们通过夺取生产的控制权，而不是通过罢工或停业，要挟管理者答应他们的要求。最初轰动一时的“生产管理斗争”事件，包括《读卖新闻》、京成电铁和三井美呗煤矿事件，都发生于1945年后半年的数月间。结果是劳动者的要求得以实现，从而也就放弃了他们所夺取的管理权。然而，事情很快变得明显，这一战略具有爆炸性的含义。夺取企业
258 常常反映出劳动者方面相信：企业主和经营者们暗中蓄意破坏经济复兴，希冀这会促使美国人放弃他们的民主计划。通过维持生产，工人们把自己看作是渴望协助解决经济危机的人。除此之外，他们的接管行为也显示出日益成长的信心：他们能够做出基本决策，而先前这被视为管理者独有的特权。对某些激进主义者来说，在战败的日本，生产管理运动似乎是新生“苏维埃”出现的信号。

毫无疑问，这一运动戏剧性地挑战了资本主义关系中劳资双方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投降时期的混乱和匮乏中，极大地吸引了旁观者的注目，而并非仅仅是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工人接管一批工厂。工人们维持生产的努力，往往获得公众的支持。在许多事件中，他们居然成功地增加了产量，从而既证明了自身的管理才能，又证实了被他们排挤到一边的经营者和所有者的不称职或者蓄意破坏。成功自有后来人。1946年1月，有13起“生产管理”事件被报道，2月20起，3月39起，4月53起，5月56起。每月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参与其中，主要集中于东京地区和机械工业领域。此后事件的数量开始下降，但还未达到使政府和企业界安心的水平。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每月平均约有30起“生

产管理斗争”事件发生。⁴

日本政府与盟军统帅部，不失时机地谴责劳工和左翼严重干扰经济复兴。这一招十分阴险。工人们的要求几乎始终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是想在经济混乱时期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尽管工会组织善于利用新获得的罢工权利，然而大多数罢工持续期都很短。实际上，他们最流行的战术是“二十四小时罢工”。SCAP 的统计资料显示，到 1948 年 7 月，仅有一个月例外，罢工中“人日”（即一个人一天完成的工作量）数量的损失，从未超过全部可用人日总数的 1%。⁵另有些许作业时间由于生产减速或其他战术而损耗，但较之于资本方囤积战略物资、向黑市转移货物和故意的延迟行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不用说与政府处理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无策无为相提并论了。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在于，“自下而起的革命”的威胁，是否真正超出了旧有的劳工运动和选举政治的界限。

“红旗的海洋”

1946 年春，革命浪潮更加高涨。经过曲折复杂的幕后操纵，吉田茂于 5 月 22 日首次组阁。后来他满怀感慨地谈起，自己在“一片红旗的海洋”中就职的情形。⁶吉田的回忆实在是毫不夸张。他所崇拜的“日之丸”旗被占领军当局所禁止，短时间内取而代之的，就是街道上飘扬的红旗。

吉田清楚记得的红旗，主要是与工人而非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从 4 月 10 日总选举前夕开始飘扬在大街小巷。妇女首次获得投票权，选民们面对的是至少代表 363 个政党的 2770 名候选人。数百名保守派政治家被清理出局。尽管半数以上的候选者隶属于五大政党之一，但是 95% 的候选人是从未担任过公职的新人。保守派候选人有明显的优势，他们继承了被清除的前任政治家们的选举地盘，而左翼候选人还在为建立新的支持基础而努力。⁷

总选举前 3 天，由 69 个工农团体和 45 个文化团体发起的集会，吸引了大约 7 万人聚集到东京市区的日比谷公园。这次集会是旨在推翻反动的币原政权而召集的“人民大会”。由运输业工会提供的 50 多辆大卡车，将参加集会者从东京各区载往会场。国铁工会的成员安排临近县的



被禁 10 年之后，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于 1946 年恢复。劳动者们尝试用英语口号呼吁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人民战线”。（照片背景中要求保护工作的母亲们的标语，有拼写错误。）妇女参加群众和劳工示威活动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战前军国主义分子上台之前。

260



1946 年 5 月中旬惹人注目的“粮食五一节”示威活动，其背后的动力，就来源于这样的邻里集会。当地的家庭主妇们抗议政府匮乏的粮食配给体制。她们打出的草席标语“让我们吃饱饭好干活”，具有鲜明的本土质感，使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日本的“米骚动”，那次风潮也是由家庭主妇们领导的草根抗议活动引发的。

农民免费乘车前往。朝鲜人劳动者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他们派遣了数千人与会。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比谷公园甚至连树上都站满了人，到处红旗招展，标语“林立”。

《朝日新闻》感情洋溢的报道，使得示威活动听上去更像是日本中 261 世纪战争纪事中的战斗场面，尽管标语布告上的口号明显是当代的：“打倒币原内阁——有钱人的拥护者和人民之敌！”“建立人民政府，结束饥饿！”“经由人民之手的民主宪法！”自由主义者如石桥湛山，也加入到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演讲者中间。他后来很快升任为吉田茂内阁饱受烦扰的大藏大臣。民众激烈地质问他，叫喊着他应当下台，除非是与保守派断绝关系。各项决议在鼓掌和欢呼声中通过，包括经由“民主革命”推翻政府。

受此次集会的激励，约 5 万民众继续行进到首相府邸请愿。警方声称，在后来发生的混乱对抗中，有几名警察负轻伤。当民众冲破大门，开始向首相官邸进发时，警察也开枪了。尽管未造成严重伤亡，但还是导致配备有装甲车和架设在吉普车上的机关枪的美国宪兵队介入，以恢复秩序。由德田球一率领的 13 人代表团，最终被允许进入首相官邸并且提出要求。但是币原首相本人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召见他们。在会见中，德田告诉币原，说他如此肥胖，绝不可能是靠政府限定的每月 500 日元的国民收入限额过活。抗议者们的言辞变得如此严苛，上了年纪的币原首相惊惶失措，最终逃离了会见室。⁸

总选举的结果，将一批所属各异而又毫无组织的议员选举到国会，直到最终吉田茂才拼凑成立联合内阁，致使即将去职的币原留任达 6 个星期之久。当政治家们忙于争论、讨价还价之时，粮食配给制变得更加混乱无章，民众的不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宣泄。5 月 1 日，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集会游行。据警方记录，参加集会的人数是 125 万人，但据组织者方面推定，集会人数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东京的参加者人数令人震惊，多达 50 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涌进了皇居前的广场。

此前一天，一位横滨的工人在日记中简短记述：“昨天是天皇的生日，并非节日。但明天的国际劳动节，我们将休假一天……世界变化真大啊！”新闻报道传达出同样的认识变化。《朝日新闻》的版面，上面的

标题是“与世界一致的、历史的国际劳动节”；中间的标题是“百万劳动者大团结”；下面的标题则是“向民主日本努力前进”。一位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记者马克·盖恩（Mark Gayn），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在日记中，他将其描绘为连续不断地歌唱和不同寻常地洋溢着热情和欢乐的一天。盖恩写道：“尽管天空是灰色的，但这是一次欢快的集会。到处充满了热情和我在日本从未见到的自信。”在别的场合，他也提到“充满不可思议的欢乐的一天，或许是战争囚徒重获自由时的那种明亮的喜悦”。盖恩评论说，红旗使人联想到劳工运动，而不是叛乱。当他通过翻译询问一位工人为什么示威时，被告知“因为我相信民主国家的主权应当属于人民”。诸如“让我们吃饱才能工作”的标语口号，一如既往地唤起着对粮食危机的关注。其他人则呼吁“即时结成民主人民战线！”性别平等的新认知，在诸如“男女同工同酬”等标语口号中体现出来。⁹

对《朝日新闻》备感兴奋的时事报道员来说，这些事件表现出“向建设民主日本迈出的强有力的一步，像凤凰从战争灾难中重生”。组织国际劳动节庆典的执委会，自认为是承袭《波茨坦宣言》和同盟国对日政策的精神进行活动。而这一点，事后被证实过于天真。在显然是为SCAP和同盟国准备的信函中，组织者们以这样的言辞开篇：

我们向同盟国采取解放日本国民、赐予他们自由、保障工农权利的措施，表示最深挚的谢意。

受此鼓舞，我们希望根除封建的、独裁的压迫；基于日本国民的真正意愿建立人民政府，决不再次破坏世界和平；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再威胁国民的生活；并且成为世界公认的和平民主国家。

信函接下来逐条详细说明“官僚、资本家、地主和其他的利益集团”如何妨害这些目标的实现，从而揭露他们是“民主革命真正的敌人”。¹⁰

5月12日，东京世田谷区下马一带的居民举行了小规模索要大米配给的“区民大会”。这成了本月第二个“五一节”——“粮食五一节”

的灵感来源。野坂参三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现场，或许是被“可爱的”革命的新精神感染而过于兴奋，他令人震惊地宣布，除了直接向天皇请愿别无他法。这一想法得到了其他演说者的赞同。一系列决议被通过，并将作为“国民之声”一同呈交给裕仁天皇。于是下马的示威活动参加者分为两队，一队向世田谷区政府请愿，另一队则向皇居进发。

在皇居他们与皇宫卫士发生了小型的非暴力冲突，此后 113 名举着零星的红旗的男人、主妇和孩童，被准许进入皇宫地界，向一位宫内省的代表递交他们的要求。时代真是变了！在这次史无前例的闯入事件中，他们真的检查了皇宫的御膳房，在那儿他们自然发现了一般家庭的饭桌上看不到的食物。他们的行为，鼓舞了面临配给问题的东京其他地区的“粮食示威”活动，并成为引燃一周后“粮食五一节”的星星之火。

当世田谷区被指派的地方官员谦卑地上书天皇，请求对此次无礼事件的原谅时，当地居民则迫使他们辞职，并要求继任者当由选举产生。这是草根民主意识的一次重大表现。因为在战前的政治体制下、甚至早在军部掌权之前，独裁控制就通过指派官员形成的密集网络，贯彻到每个居民区。现在当地居民，包括强大的家庭主妇军团，不仅不服从权威，还竟然要求改变它。

“粮食五一节”当天，大约 25 万人聚集在皇居前的广场上。后来，由于这一事件此广场被命名为“人民广场”。尽管一直有女性参加这样的示威活动，这次出席的家庭主妇和孩子们，与教师率领的女学生队伍，仍然格外引人注目。一位背着婴儿的虚弱的母亲，向群众诉说她所在的居民区已经两周得不到大米配给了。她说由于只能“喝米汤和吃野菜做的团子”，她根本没有乳汁给孩子哺乳。当她向群众讲话的时候，孩子的哀泣声通过扩音器阵阵传来。一位五年级的男孩也同样发自内心地控诉。他告诉人们，他渴望补上被战争打断的学校功课，但由于粮食危机导致授课时间缩短，这变得不可能了。德田球一对天皇的揶揄赢得了喝彩：“我们在挨饿。而他怎么样呢？……可能天皇只会说，‘啊，是那样吗？啊，是那样吗？’”¹¹

然而，5 月中旬发生的这些事件，其意识形态矛盾混乱。最大的原因是，民众的抗议运动，竟然采取了上奏天皇的形式。5 月 19 日通过的

决议，很快整理成向天皇的正式请愿书。在请愿书中，天皇依然被传统地尊为“君主”、“最高权力者”，被恭请对民众的意愿进行適切处置。请愿者们申述，请求天皇采取措施，排除导致日本濒于饥饿和毁灭边缘的腐败的政治家、官僚、资本家和地主。作为对他们的取代，天皇应当支持包括工人、农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战线。¹²

自下而起的革命，其思想观念的混乱状况，在这次陈情书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天皇当然毫不令人意外地拒绝接受。正如在写给麦克阿瑟将军的私人信函中，经常矛盾地混合着对自由民主的赞颂与奉承话一样，自认的左翼们，也以其不可思议地向绝对的权威天皇进行传统请愿的方式，玷污了这次要求创建民主的人民政府的运动。德田球一可能会因为他对天皇的小小揶揄而自得其乐，但更大的讽刺则是，共产党在激烈冲突的时刻，竟然选择了拥戴君主制的做法。

考虑到请愿发生的时代背景，对“最高权力者”天皇的请愿活动，就更加显出异样：宣告国民主权的新宪法草案刚刚颁布；第一次承认男女平等普选权的总选举刚刚实施；在产业领域工人们公然挑战传统的劳资关系；女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学生们则要求扩大自治；人们第一次自由地公开谈论、传播关于天皇的玩笑。而左翼的领导者们却选择了在此时机，谦恭地向天皇请愿，恭请他解决粮食危机，批判腐败官僚，并对民主革命事业进行指导。世界民主革命运动史上，鲜有如此滑稽荒唐的一幕。

裕仁天皇最后的反应早在意料之中。5月24日，在他自划时代的投降时刻以来的首次广播中，他重申对国民团结的要求。正如他在战争中一直所做的那样，天皇表达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注。他总结说，值此艰难境地，²⁶⁵“朕切望国民实行家族国家的传统精神，来应对困境，勿念一己之利害，在重建祖国的道路上努力前进。”这完全是老套的言辞，20年来的战争和压抑期间一贯如此。当日天皇的广播重播了三次。¹³

对于战后初期的大众运动来说，其意识形态的矛盾混乱是意料中事。出人意料、并且带来比示威者错位的维护君主制的做法或是天皇了无新意的空泛言辞更为严重的后果的，则是最高统帅的严厉态度。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日本人民可以一定程度“采用武力”的问题，在《投降后初期的对日方针》的政策文件中，就已经明确阐释，是

有章可循的。这保证了当发生针对根除封建的专制主义倾向的行为时，只有在威胁到占领军安全或者其他基本的占领目的之场合，最高统帅才能干预其事。¹⁴

1946年5月的示威活动，远未达到如此界限。的确是发生了一些混乱的行为：首相的官邸连同他本人的尊严都受到了些许伤害。当然皇宫的御厨房也被平头百姓的闯入玷污了。尽管最终有数百万人参与了遍及全国的集会和抗议活动，却没有发生破坏和严重的暴力行为，没有发生死亡事件或者严重的伤害事件。更没有对占领军的安全和权威造成任何的威胁。尽管如此，但是5月20日麦克阿瑟认为时机已到，他警告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有组织领导的集团暴力行为的倾向，造成了对日本未来发展的重大威胁”。

最高司令官的警告令，谴责了“少数捣乱分子的过激行为”，这一在日语中被译为“暴民デモ”的字眼，带来了半年前由最高统帅下令废除的《治安维持法》中所使用语言的冰冷记忆。字典对“暴民”的定义为“暴徒，聚众闹事者，叛乱分子”，“デモ”则是来自英语的借词，即“demonstration”（示威）。4、5月间发生的民众风潮，尽管自身充满矛盾，但仍然是民众反抗腐败无能政府的历史性的象征，却被以这样恐吓性的字眼，蒙上了暴民统治的污名。

马克·盖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声明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我回想不起任何美方的动作曾招致过如此巨大的反响。它使工会本部和 266 左翼政党事务所大为惶恐，也使保守派阵营毫不掩饰地欢呼雀跃。”第二天，麦克阿瑟召见还在苦苦思虑组阁事宜的吉田茂，并许诺额外的美国粮食援助以抵制饥饿。翌日，一直以来意气消沉的吉田茂宣布组阁成功。¹⁵

这只是胜利者在实现民主革命是否许可的手段之间划下明确界限的一个信号，而他们最终倾向了保守派一边。当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一前一后发表声明之际，对日理事会东京会见的美国代表，同样抓住5月抗议运动的时机，打响了同时针对苏联与日本民众运动的反共战役，认定它们之间密谋勾结。甚至是对五一节集会组织者呈交同盟国方面的信件，美国代表也毫无理由地断言，有从一种“外国语言”翻译而来的痕迹，即暗示这是俄国人写的信。这种轻慢、污蔑的方式，很快成了拒绝

任何真正激进的民意表达的惯常做法。¹⁶

这种严厉打压的保守倾向，在有名的“标语牌事件”中表露无遗。在此事件中，“粮食五一节”的许多暧昧之处都有所展现：来自社会底层的自发运动，向天皇哀告的同时对天皇绝妙的嘲弄以及美国人自身对天皇的崇敬之情。涉案的标语牌，是一块由精密机械厂工人、共产党员松岛松太郎书写并带到示威现场的粗糙的布告牌。布告以半文半白的语言，戏仿天皇庄严的口吻写道：

诏书

国体得以维系，
朕饱食终日。
你们人民，饥饿死去。
——钦此

标语牌的另一面，有一段不太经常被引用的话：“为什么不管我们怎样拼命工作都得挨饿？答案就是，裕仁天皇！”¹⁷

这份天皇诏书的仿作诙谐放肆，无论松岛与其工厂的共产党团体是如何想出来的点子，都表明了一种迹象，即经过数十年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统治之后，人民表现出来的有益健康的破除偶像的精神。但是政府却不这么认为，而是于天皇“家族国家”敕语发表的当天，以不敬罪（旧刑法第七十四条）签署了对松岛的逮捕令。值此之际，刑法典的修订正在盟军司令部主持下进行，而是否保留战前不敬罪的条款仍然争执不下。标语牌事件，成了保守派政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隔绝对天皇批评指责的试金石。¹⁸

对大多数接受了国民自由权利思想的日本人而言，事情总是出人意表。这一事件再次让人回想起《治安维持法》的恐怖年代。占领军当局竟然允许开庭审理此案。当美国人最终要求日本政府将不敬罪的条款从刑法中去除之时，他们却允许对松岛进行审判。松岛于6月22日被起诉。10月，显然是迫于最高司令部的压力，起诉的罪名改为“损毁名誉”。11月2日，东京地区法院判定松岛松太郎有罪，并处8个月监禁。但在第二天，松岛就由于新宪法颁布和天皇实施恩赦被开释了。

松岛松太郎对有罪的判决提起了上诉。1947年6月，上诉法庭裁定，松岛的确犯有不敬（而非毁损名誉罪），但是已经因为天皇恩赦被免于执行。当这位倒霉的举标语牌的人，试图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时，诉状却于1948年5月被驳回。理由是恩赦使他的公诉权无效。从天皇方面看来，这不失为展示天恩宏大惠及最不知恩义的臣民的绝妙例证。但是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标语牌事件，更像是暗示新的天皇制民主边界的指示牌。¹⁹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当麦克阿瑟以申斥“少数捣乱分子”为大众运动降温之时，民众运动并未完全冻结。“粮食五一节”一周之后，东京地区约20所大专院校和专门学校的上千名学生，以“学生五一节”的名义，发起了第三轮“五一节”示威。他们不仅呼吁教员、学生和职员的大学生自治，还号召学生们在搜查“战犯教授”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以某种傲慢的姿态，这些天之骄子们也证实了他们与“大众”在民主革命中的团结一致。²⁰

“学生五一节”所选择的日期，体现出日本民主化进程中一项持久不变的特征，即出于运动成功的考虑，以某种方式与日本国内运动的先例联系起来。5月1日的集会，是借日本庆祝“国际劳动节”17周年之际举行的。导致粮食五一节达到顶点的“索米”运动，使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米骚动，当时由家庭主妇们抗议粮食不足引发的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宣告了“大正民主时代”的到来。与此相似，“学生五一节”所选择的日期，是著名的“滝川事件”13周年纪念日。在那次事件中，京都帝国大学的滝川幸辰教授，因为自由主义思想遭到驱逐。在这些学生示威运动中，涌现出的反军国主义思想和对既定权威的怀疑姿态，导致了翌年激进的“学生组织全学连”（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的创立。

尽管美国的食物输送避免了5月中旬预期的严重的粮食危机，但是其后持续破坏性的通货膨胀，无情地抵消了工人们赢得的每一次工资增长。1947年初，据国铁工会推算，国铁工会成员的平均工资只够承担家庭生活费用的1/4。²¹在此情形之下，工会活动家即使是在麦克阿瑟发布警告之后，仍然在工会组织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反共产党系的社会

党领导下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以及对手共产党系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简称产别），皆创立于1946年8月。两个月后，产别领导动员了全国范围的“十月斗争”。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劳动争议损失“人日”（劳动者一人一天的作业量损失），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超过了理论上全劳动产出量的1%。这次斗争的一个契机，是由于政府解雇大量国铁工人和其他部门的公务员。继之而来的是，日本劳动史上最大的事件——1947年2月1日的总罢工计划。

起初，由于受到共产党系工会所代表的300万工人与中立派及反共系势力的支援，总罢工计划是“和平革命”激进构想的分水岭；最终这一事件却成为了左翼反美主义的转折点。依照计划，罢工期间政府机关和主要产业都将关闭，除占领体制赖以运营的必要部门以外，通信业务也将停止。罢工策划者承诺，将不会妨害粮食输送，而国铁也将继续为占领军提供服务。当2月1日逐渐临近，全国的紧张气氛愈加浓厚。甚至连偏远的乡村地区，也出现了支持罢工的布告。“青年队”组织起来以保护罢工；对共产党的支持日增；在国铁的列车上，出现了号召打倒吉田政权的标语。

1月30日，当劳动组合指导部与政府之间的交涉完全决裂时，总罢工的趋势看来在所难免。翌日午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干预，宣布他不允许“诉诸如此致命的社会武器”。由此，“二·一大罢工”变成了政治传说。保守主义者在5月20日麦克阿瑟警告“少数捣乱分子”时，还只是欢欣鼓舞，至此则欣喜若狂。工会领袖公然洒泪，他们中的激进者，现在已经苦涩地将美国视为善于欺骗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之敌。

左翼对美国胜利者是伪善者大于解放者的新见解，由伊井弥四郎令人难忘地传达出来。伊井是日本全官公厅劳组共同斗争委员会（简称全共斗，意即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企业机关职员工会）议长，他关于最高统帅干预的见证说明，成了战后日本劳工运动史上无法磨灭的痕迹。据伊井所述，他于1月31日夜，被盟军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马夸特（William Marquat）少将召见，并被命令签署中止罢工的声明。伊井反问道：“这叫什么民主？”他声称日本的工会组织是民主的，政策决议由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因而他没有权力取消计划好的罢工。伊井徒劳地向马夸特尽力保证，罢工者并未企图妨害占领军事务或是粮食输送。此时，马夸

特明显发怒地拍着桌子，七八个美国宪兵冲了进来，挥舞着手枪以示威胁。这时轮到伊井被激怒了。他质问美国人为何以暴力相要挟，并大喊：“日本工人不是美国人的奴隶！日本工人不是傻瓜！”当冷静下来之后，马夸特命令宪兵离开，并找来另一位工人领袖，劝告伊井说，许多工会已经决定放弃罢工了。伊井此时才同意起草声明中止总罢工。声明当场就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得到了马夸特的批准。当身影总是无处不在、热情洋溢的、激进的德田球一突然出现在 NHK 放送局，喃喃说出“停止罢工”的时候，伊井弥四郎虽不情愿然而别无选择的结论得到了确认。

在伊井弥四郎最为黯然的时刻，他仍然尽力传达出诚实和希望的印象。在广播取消罢工的声明时，伊井对马夸特批准的文本进行了改动。伊井昭告他的劳工支持者们，人常常不得不进二退一。他向“工人和农民”高呼万岁。他声音嘶哑、饱含深情地流泪。身穿军用短上衣的伊井，一只手拿着眼镜，擦去眼中泪水的照片，将他极度的苦闷留在了民众的记忆之中。他的许多听众也哭泣了。当然，这也被后来的左翼叙事建构成了神话：“无尽的愤怒的泪水，工人们本能地对日本政府和美国人感到愤怒。”数年后，伊井弥四郎将此称为重要的时刻，由此，美军占领当局“只是在口头上拿民主欺骗日本民众”变得一清二楚。尽管 1947 年 4 月的总选举产生了短暂的社会党领导的联合内阁，而且工会成员的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对“二·一总罢工”的镇压，却标志着劳动者作为平等的一员分享“民主”权利的可能性开始终结。²²

并非只有盟军司令部和日本保守派对共产党抱持不信任的态度，工会和左派的领导人也相互对立，从而分裂为共产党员、同情共产党者、各色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充满敌意的反共主义者等各种帮派。至少，日本共产党对占领初期“和平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贡献，具有双刃性。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在鼓舞和组织民众力量、对抗反对改革的日本政府和拖改革后腿的企业方面，比任何其他势力团体发挥出了更加有效的指导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激进的左翼也常常蔑视政治民主的“资产阶级”性，并且表现出贬低由最高统帅推进的政治和公民权利重要性的倾向。

“粮食先于宪法”，是 1946 年 5 月大众斗争中日本共产党打出的旗

帜。考虑到饥饿和飞涨的物价，对于平民生死攸关的状况，这种主张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却反应不出对政治民主制度化的积极承担。与其战前的立场相一致，日本共产党更加倾向于关注打倒“封建遗制”或“反动政府”，而不是对权利的创造和扩张。无论在党外还是党内，日本共产党都很难说是多样性见解的支持者。这一自命为真正的人民民主运动先锋队的集团，实际上却损害了真正有效的、具有广泛支持基础的民主联合政权的出现。而另一方面，任何其他的进步团体，无论自由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其拥有的激情勇气和使命感都无法与这个时代“可爱的日本共产党”相提并论。²³

当时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可预见的恶性循环相继发生。共产党人和工会的激进派变得更加具有战斗精神，对盟军总司令部日渐敌视，使得美国人越发倾向于放弃改革、接纳保守派官僚。占领体制日趋保守化，反而驱使激进派的斗士发表更加强硬的声明和采取更为敌对的行动。起初，最高统帅部开始在公职人员内部搜集不受欢迎的“赤色分子”名单，很快这些名单引起了高度重视。1948年夏，占领当局的劳动政策逆



日本共产党在战后合法化，从最初欢呼占领军为“解放军”，转而成为批判占领政策“倒行逆施”的重要力量。日本共产党强大的号召力，在此照片中可见一斑。这是1949年2月，人们正在听极富魅力的日共领袖德田球一演讲。

转，取消了公务员的罢工权利。而公务员由于在薪金低廉、解聘危机方面首当其冲，往往站在激进工会最前卫的位置。与此同时，占领军当局 272 在幕后不懈策划，在工会工人内部推出恶毒的反共主义的“民主化”运动。

到了1949年，“赤狩”（逮捕赤色分子）成了占领下新的流行语，以日本式的英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为“レッドパージ”。起初占领军内部称之为“排除捣蛋分子”，在占领当局官员、保守派政治家、日本政府官僚和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协助下进行，主要目的是在企业 and 产业层面解散激进的工会组织。为此，1949年末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期间，公共部门大约有11000名工会活动家被解雇。战争开始后，“赤狩”扩展到了民间私营部门（包括大众传媒），至1950年底导致另外10000到11000名左翼雇员被解雇。与“赤狩”并行的是“赦免”，那些先前由于积极支持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而被“永远”开除的对象，重新恢复公共活动。²⁴

1950年1月，野坂参三自认作为“可爱的共产党”政策的责任人，甘愿受到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严厉的公开批判，日本共产党陷入一片混乱。5月18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政治局批准，发表了富于战斗精神的52页长文。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记述者，恰如其分地将其概括为举行“‘可爱的共产党’的葬礼”。对共产党员和激进派而言，其后的事态发展迅速而且具有灾难性。5月30日，美军阵亡将士纪念日典礼在皇居前的广场上举行，由于共产党的示威而被迫中断。在构成占领印象速记的富有象征性的行为中，这一次走得最远。在意图破坏占领的日美间的首次暴力冲突中，4名美国人遭投掷石块和殴打，为此8名日本示威者被逮捕。共产党机关报不计后果地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并赞誉他们是“爱国者”。6月6日，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将日共中央委员会24名成员全部“开除公职”。翌日，他将开除对象扩大到了共产党机关报的17位编辑人员。尽管共产党及其机关报未被查禁，但主要领导人包括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在内，在占领期间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德田球一设法逃亡中国，6年后在那里逝世。²⁵

尽管最终被边缘化，但是左翼以重要而持久的方式，对勾画日本民主化的轮廓做出了贡献。正如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各种版本的马克思 273

主义已经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激进的或者异端的观念，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见惯不惊。考虑到工会和左翼在动员大众运动方面大获成功，尽管他们遭到了削弱，但是仍然成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经济方面，其后果之一就是产生了与美国模式迥异的资本主义形态。日本有影响力的经济政策决策者，往往在精英大学中受过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的熏陶，赞同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诉求。保障工作安定和消除经济差距的政策目标，在日本被广泛接受。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者，虽然避免激进的、独立自主的工会运动的出现，但是他们与工会领导人合作，促进与“企业内工会”之间劳资关系的协调，正面应对工会方面的诸多要求。

尽管占领军当局的“倒行逆施”，帮助确立起日本国内保守派的政治家、官僚和企业家的统治权，致使他们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但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人继续在国会当选，并且在有关公共政策的议论场合获得注目。他们成为日本默从美国冷战政策的最为明确的批判者，同时也是（此处绝无反讽之讥）其后数十年间，占领当初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理念的最为坚定的拥护者。

注释：

- 1 藤原彰编《日本民众的历史 第十卷 占领と民众运动》（东京：三省堂，1975），pp. 61 - 62；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选集 战后编》（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6），pp. 3 - 19；社会运动资料刊行会编《日本共产党资料大成》（东京：黄土社，1951），pp. 52 - 56；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 败战と占领》（东京：青木书店，1990），pp. 221 - 223。
- 2 这些官方数据见于多种文献。如大河内一男《战后日本の劳动运动 改订版》（东京：岩波新书，1961），p. 75；亦参见日本共产党调查委员会编《占领下日本の分析》（东京：三一书房，1954），pp. 205 - 207。后一文献是日本共产党对占领的正式批判。
- 3 大河内《战后日本の劳动运动 改订版》，p. 41；日本共产党调查委员会编《占领下日本の分析》，p. 207。
- 4 有关生产管理斗争的基本英文文献，是 Joe Moore, *Japanese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945 - 1947*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本书第 104 页对此有全面统计。还可参见大河内《战后日本の劳动运动 改订版》，p. 48，以及《朝日年鉴》1947 年版，pp. 234 - 235。
- 5 Miriam Farley, *Aspects of Japan's Labor Problems* (New York: John Day, 1950)，

pp. 82 - 85, 97.

- 6 Shigeru Yoshida (吉田茂), *The Yoshida Memoirs: The Story of Japan in Crisi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pp. 75, 200, 228。有关吉田茂惧怕左翼的更为宽泛的背景, 参见 J.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 - 1954*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9), 第八章。
- 7 Junnosuke Masumi, *Postwar Politics in Japan, 1945 - 1955*, Japan Research Monograph 6 (Berkeley: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 96 - 97.
- 8 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 讲谈社, 1989), 第7卷, pp. 238 - 239; 此文献下引为 SNZ。亦可参见 Moore, pp. 170 - 177, 以及原始文献 Mark Gayn 的 Japan Diary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48), pp. 164 - 169。
- 9 Gayn, pp. 196 - 200; SNZ 7: 250 - 251;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 pp. 226 - 227。
- 10 书简的全文, 参见队日理事会的议事录, 收入 Moore 前引书, pp. 178 - 179。
- 11 SNZ 7: 260; Gayn 前引书, pp. 226 - 231。
- 12 文件的全文, 参见朝日ジャーナル编《昭和史の瞬間》(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74), 第2卷, p. 160。亦参见 SNZ 7: 258 - 260。
- 13 朝日ジャーナル编《昭和史の瞬間》, p. 166。天皇玉音放送的全译文, 见载于 SCAP 盟军司令部, *Summation: Non-Military Activities in Japan* 8 (May 1946), p. 31。
- 14 美方《投降后初期的对日方针》中的关键部分如下: “此方针乃利用而非支持日本现有之政府形态。日本人民或政府发起的旨在消除其封建专制倾向的政府形态之改变, 将得到允许和支持。如果上述改变之完成, 涉及日本人民或政府对反对者动用武力, 最高统帅将只在必须确保占领军安全及其他一切占领目标达成之时, 进行干预。”
- 15 Gayn, p. 231。麦克阿瑟的声明之全文, 收入 Moore 前引书, p. 184; 亦可参见盟军司令部民政局,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Washington, D. C., 1949), 第2卷, p. 762。GHQ 内部制作的机密然而广为散发的谍报报告中提到, “五一节庆典盛况空前。它们展示了占领当局给予日本人民的新的自由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力, 倘加以适当引导, 可以成为日本民主重建的潜在力量”。在“法律与秩序”的条目下, 此报告书记录“尽管示威者人数众多, 内务省报告说全日本绝无暴乱或秩序混乱发生”。至于麦克阿瑟的警告令, 据说“民众整体的情绪十分平静。发生了零星的暴力行为, 但是性质皆不严重。然而不能排除形势恶化的可能性。于是5月20日, 最高统帅为防止极少数捣乱分子发动暴乱与进行人身威胁而发出强烈警告。警告令占据了日本媒体的突出位置, 并且收效显著。此后群众游行的数量大幅减少”; *Summation: Non-Military Activities in Japan* 8 (May 1946), pp. 29 - 30, 37。
- 16 Moore, pp. 179 - 180。
- 17 SNZ 7: 260。根据某些记录, 松岛所在的公司与“日本共产党”的字样, 也出现在标语牌上, 如参见朝日ジャーナル编《昭和史の瞬間》, p. 166。标语的最后一

行（“钦此”）是手写体，因而并未仿冒天皇的玉玺。

- 18 并非只有松岛的标语牌嘲弄天皇。一名年轻的女示威者，当时挥舞着一条制作粗糙而又措辞粗鲁的标语，大意是说“嘿老头，如果我没的吃就得死，可我不买快死的”；SNNZ 7: 257。
- 19 《战后史大事典》（东京：三省堂，1991），p. 804；SNNZ 7: 260, 266, 281, 302, 308, 312。总司令部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参见 Alfred C. Oppler, *Legal Reform in Occupied Japan: A Participant Looks Back*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74, 165 - 168。
- 20 三一书房編集部编《资料战后学生运动》（东京：三一书房，1968），第1卷，pp. 51 - 52。亦参见 SNNZ 7: 263。
- 21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pp. 193 - 198, 213。
- 22 Moore 对中途夭折的二·一总罢工前后工人运动的发展有详尽论述，参见 Moore 前引书，pp. 185 - 243。关于总司令部的敌对立场，参见 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pp. 277 - 300。有关日文文献，参见劳动运动史研究会编《占领下の劳动争议》（东京，劳动旬报社，1972），pp. 9 - 69，尤其是 pp. 48 - 55；以及左藤一郎《二·一スト前后》（东京：社会评论社，1972），p. 241。伊井对事件的回顾，参见《世界》1951年月号二·一总罢工回想特集。其中的一幅著名照片，收入 SNNZ 8: 45。
- 23 《朝日年鉴》，1947年版，p. 103；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 败战と占领》，pp. 220 - 228, 236 - 238。
- 24 与此相关的背景，参见 Dower 前引书，pp. 306 - 368。1948年，“赦免”一词已经成为当时的基本用语；参见《现代用语の基础知识 一九四八年》（东京：时局月报社，《自由国民》特别号十四号），p. 29。
- 25 日刊劳动通信社编《战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东京：日刊劳动社，1955），pp. 55 - 60；社会运动资料刊行会编《日本共产党资料大全》，pp. 391 - 395；Rodger Swearingen 与 Paul Langer, *Red Flag in Japa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Action 1919 - 195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Greenwood Press 再版, N. Y., 1968), pp. 199 - 212。